

# 改革开放 40 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研究综述\*

傅艳蕾

**【内容提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展开了多方面探讨,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的阶段性研究、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特点的整体性研究以及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预测性研究三大类。整体来看,研究成果丰硕,立意多样鲜明,但也存在观点之间的矛盾分歧和理论缺陷,在阶段性研究、整体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三方面均存在深化研究的突破点。

**【关键词】** 改革开放 40 年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 话语表述

**作者简介:** 傅艳蕾(1985-),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浙江湖州 313000)。

意识形态工作历来受到我们党的高度重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意识形态话语也随之做出调整,彰显出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导向和工作重心。不少学者对此进行学术研究,他们以发展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展开了多方面探讨,尤其在 2010 年后出现了一波研究高潮。今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对这类相关文献进行综合梳理,有助于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现状,并从理论上发现问题,找到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的突破点。

## 一、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的阶段性研究

有不少学者尝试从“话语表述”的角度,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分阶段研究,产生了“二阶段论”“三阶段论”“五阶段论”三种主要的观点,其中又以“二阶段论”占多数。

### 1. “二阶段论”

持“二阶段论”的学者以不同的年份为界,从两个阶段来提炼概括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例如,有学者以 2009 年为界,将 1978—2009 年和 2009 年以来两个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分别表述为“以经济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以社会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前一阶段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后一阶段正式步入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后改革”时代<sup>①</sup>。还有学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与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和湖州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预研究项目“‘个体需求’视角下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研究”(2014SKYY10)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竹立家:《“中国话语”变迁与构建》,《人民论坛》2012 年第 12 期。

者同样以2009年为界,将前后两个阶段概括为“以经济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以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前一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一阶段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sup>①</sup>。有学者以1984年为界,认为1984年以前是“党的经济改革话语的生成”阶段,这一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受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和“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国内背景的双重影响而形成;1984年以后是“党的经济改革话语的演变”阶段,以经济改革话语为核心,根据我国具体国情的不断变化而进行话语各方面的创新演化<sup>②</sup>。另有学者以1992年为界,指出“共同富裕导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别是前后两个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总纲。前一阶段,邓小平揭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根本愿望,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导向的科学归位;后一阶段,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等概念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成为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武装人们头脑的重要的思想武器,而这些思想都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sup>③</sup>。还有学者以2001年为界,认为前一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是以“建设”为核心,这是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邓小平在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反复思考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后一阶段则以“全面发展”为核心话语,是我党在“以人为本”的话语群、“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话语群、“统筹兼顾”的话语群基础上逐步确立起来的<sup>④</sup>。可见,即使都持“二阶段论”观点,不同学者在年限的划分以及前后两个阶段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的提炼概括上也各有差异。

## 2. “三阶段论”与“五阶段论”

持“三阶段论”的学者认为,“实践标准论”“初级阶段论”和“三个代表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核心话语。“实践标准论”是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创新的第一个阶段,即用实践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以此作为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基础;“初级阶段论”是意识形态创新的第二个阶段,它强调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性,坚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在逻辑上的自圆其说;“三个代表论”是意识形态创新的第三个阶段,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法理根据<sup>⑤</sup>。而持“五阶段论”的学者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和概括:1978—1983年为拨乱反正期,以“恢复马列主义教育”“开展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为意识形态话语的重点表达内容;1983—1989年为曲折前进期,以“马列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思想品德”“形势与政策”“品德和纪律”“法律基础”“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为重点表达内容;1989—1999年为健康发展期,以“反对和平演变的宣传教育”“德育教育”以及“邓小平理论教育”为重点表达内容;1999—2012年为全面建设期,以“公民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为重点表达内容;2012年至今为创新发展期,以“中国梦主题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宣传教育”为重点表达内容<sup>⑥</sup>。

① 参见姚朝华、高洁静:《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变迁的社会维度透析及趋势研究》,《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6期。

② 参见胡荣涛:《中国共产党经济改革话语的生成与演变》,江西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③ 参见黄丽娟:《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以政治社会化研究视阈》,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④ 参见胡春阳:《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变迁及启示》,《皖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⑤ 参见萧功秦:《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⑥ 参见崔玉君:《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演变与发展趋势》,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 二、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特点的整体性研究

部分学者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一个整体，与改革开放之前的话语进行对比研究。此类学者更注重从整体上把握意识形态话语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关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理念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前后经历了从“革命”到“改革”的话语理念变迁，尽管如此，作者认为“改革”与“革命”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与历史连续性，“改革”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sup>①</sup>。有的则主张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经历了从“革命”话语向“执政”话语的转型，这种转型是中国共产党利用传统的意识形态资源为执政意识形态的构建提供历史合法性证明<sup>②</sup>。另有学者认为，从发展重心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呈现出从“革命”到“发展”的变迁，这表明在工作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的背景下意识形态话语也开始发生变化<sup>③</sup>。还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理念并非经历一次转型，而是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增长”再到“全面发展”的转变。这位学者认为，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建设被提高到了一切工作中心的位置，但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物质统治对人的本质的掩盖等问题，“发展”话语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渐凸显<sup>④</sup>。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以“革命”话语较为多见，而改革开放后则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 2. 关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宣传方式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制性色彩逐渐淡化，尊重民意的话语表达特征渐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话语在叙事语态上发生较大的变化，那种“拽大词”“排比式”“讲空话”的高调文体语言正在逐渐被简单明晰、言简意赅的大众话语所取代；同时，当前话语方式的“流行语”特征渐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方式也开始悄然发生变化，由宏大叙事转向人们的世俗生活<sup>⑤</sup>。有的学者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指出，意识形态话语渠道正在由单向向多向转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大学生除了通过课堂和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的传播渠道进行交流外，更多会选择新媒体（如网站、微信、贴吧、微博、QQ 通讯工具等）话语渠道来进行实时沟通交流<sup>⑥</sup>。有的学者认为，直接的意识形态灌输日趋淡化，新时期的政治社会化方式，不再通过强制型、单向度、简单化、片面化、形式化、批判性的方式，如开会、发文、群众运动等进行直接的意识形态灌输，而是转向以透彻说理、平等协商讨论的方式，去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sup>⑦</sup>。但另有学者主张，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已从显性走向隐形再回归显性，认为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姓“资”姓“社”这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传统意识形态话语被取代，经济建设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党的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更加被淡化，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

① 参见唐爱军：《从“革命”到“改革”——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话语变迁》，《浙江学刊》2017年第4期。

② 参见刘先春、敖小茂：《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型与启示》，《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③ 参见陈蓉蓉、吴学琴：《中国共产党发展进程中的话语变迁考察》，《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8期。

④ 参见敖小茂：《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演进与创新——以十一大至十八大党代会政治报告为分析对象》，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⑤ 参见胡银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整体变迁》，《甘肃理论学刊》2014年第6期。

⑥ 参见朱松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变迁、困境及其构建》，《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9期。

⑦ 参见黄丽娟：《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以政治社会化为研究视阈》，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回归显性化<sup>①</sup>。总体来看,学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意识形态话语开始从国家层面走向大众生活,意识形态话语的宣传方式和渠道也从单一转向多元。

### 3. 关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呈现出从封闭、单一逐渐走向开放、多元的特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经历了从革命话语下关注政权的夺取和维护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协同发展的变化,从对西式价值的完全否定到吸收其合理成分以丰富自身话语体系的转变<sup>②</sup>。而在高校,话语内容的主流与多样性同在,即马克思主义成为校园主流话语的同时,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也渗透校园,多样化价值观话语弥漫校园,大众文化中粗俗、低劣的话语内容也一度受到追捧<sup>③</sup>。学者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内容在改革开放以后更趋多样,话语体系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大。这些观点符合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事实。

## 三、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预测性研究

对于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学者们也展开了各种预测分析,提出了若干进行完善的路径,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

### 1. 主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理念的重新聚焦

意识形态话语建设首先需要确立核心理念。有的学者主张,未来应形成一整套“以公正为中心重构的改革创新话语体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基础应该是“公正”,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一个“公正价值”和“公正制度”的社会<sup>④</sup>。有的则主张,以“中国特色”这一价值取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话语。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不是“向西方文明回归”,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实物质基础,总体上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科学性<sup>⑤</sup>。另有学者认为,应坚持使用“经济改革”话语,但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改革话语又要有所区分,突出经济体制中的市场话语、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平衡话语、经济文化中的生态话语、经济环境中的开放话语、经济成果中的共享话语以及经济机制中的法治话语<sup>⑥</sup>。可见,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理念的重新聚焦和定位,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相对统一的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 2. 主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新构建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一套话语系统,是对话语理念的展开。有的学者主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地位,因为该体系高度提炼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意

① 参见敖小茂:《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演进与创新——以十一大至十八大党代会政治报告为分析对象》,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② 参见敖小茂:《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演进与创新——以十一大至十八大党代会政治报告为分析对象》,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③ 参见朱松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变迁、困境及其构建》,《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9期。

④ 参见姚朝华、高洁静:《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变迁的社会维度透析及趋势研究》,《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6期。

⑤ 参见赵迎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战略重建》,《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6期。

⑥ 参见胡荣涛:《中国共产党经济改革话语的生成与演变》,江西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识形态的核心理念,而且体系完整,内涵科学,逻辑严谨,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sup>①</sup>。有的则建议以“四个全面”来构建话语体系,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引导、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先导、全面依法治国的价值诉求、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资源以及全球化参与的共识构建<sup>②</sup>。但不论建立一套什么样的话语系统,学者普遍认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话语创新<sup>③</sup>。

### 3. 主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目标领域的重新定位

一般而言,意识形态话语的目标领域可分成国家政治生活和大众日常生活两个层面。在重新定位未来目标领域方面,大部分学者似乎都倾向于后者。例如有学者主张,意识形态话语应关注生活世界,增强话语解感力和吸引力<sup>④</sup>。有学者强调了意识形态话语几个方面的转换,即立足生活世界,从文本话语向生活话语转换;依靠社会主体,从精英话语向大众话语转换;融注情感要素,从说事话语向情感话语转换<sup>⑤</sup>。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在意识形态的话语变迁中要处理好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关系<sup>⑥</sup>。另有学者主张,通过文本叙事与生活叙事、精英叙事与大众叙事、线性叙事与非线性叙事、政治叙事与情感叙事等具体叙事方式间的互动和有效转换,来实现宏大叙事和细小叙事的兼济互补和有机结合,从而最大限度地展现和提升意识形态的叙事效果和话语功能,有效回应社会的转型诉求<sup>⑦</sup>。学者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要回归大众日常生活,即要使意识形态话语更“接地气”。

### 4. 主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时空维度的双重转化

时间与空间是未来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两个重要维度。在时间维度方面,学者大多主张保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效继承和创新发展,例如要把握时代精神,从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转换<sup>⑧</sup>;要不断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话语表达,实现意识形态对话由单向传播转向平等交互,利用网络传播媒体,拓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空间<sup>⑨</sup>。另外,还有学者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某些意识形态话语中存在的缺陷做了具体的批判性分析,指出有两个说法需特别加以警惕:一是把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片面归结为排除“左”的干扰,断言所谓“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的过程”;另一说法就是今天在关于“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问题的讨论上,有一个被一些人一直视为至宝的假命题,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sup>⑩</sup>。在空间维度上,学者大多主张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开放性与对话性,认为要增强对话意识,以开放、包容、自信的姿态提高我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对话能力<sup>⑪</sup>。

① 参见姚朝华、高洁静:《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变迁的社会维度透析及趋势研究》,《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6期。

② 参见杨彬彬、马玉婕、杜保友:《意识形态话语转换三题》,《理论导刊》2016年第8期。

③ 参见陈锡喜:《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目标、原则和重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为视角的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11期。

④ 参见朱松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变迁、困境及其构建》,《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9期。

⑤ 参见许苏明:《论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⑥ 参见胡春阳:《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变迁及启示》,《皖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⑦ 参见周俊成:《社会转型中意识形态叙事方式的转换》,《求索》2016年第8期。

⑧ 参见许苏明:《论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⑨ 参见吴春雷:《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⑩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 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

⑪ 参见郑元景:《当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变迁与重构》,《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6期。

#### 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研究的几点建议

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学者分别从横向与纵向、静态与动态、历史与现实等多个维度展开了分析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从理论上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一种概括总结，但在梳理这些成果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若干理论缺陷和漏洞，抑或成为今后学界加强这方面研究的突破口。

##### 1. 阶段性研究：注重互斥，不忘延承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的阶段性研究中，不论是主张“二阶段论”“三阶段论”还是“五阶段论”，学者的阶段划分各有理据，这里不做评价，但学者对各阶段意识形态话语的提炼表述还需进一步商榷。例如，持“二阶段论”的学者中，有的将前后两个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分别表述为“以经济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以社会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逻辑上看，后一阶段有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嫌疑，并且这里的“社会”一词界定模糊，应从“小社会”还是“大社会”的层面去理解，作者并未作清晰阐述。有的学者将两个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述为“共同富裕导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难道“共同富裕”不应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吗？还有学者表述为以“建设”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话语和以“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话语两个阶段，同样，作者并未理清“建设”与“全面发展”的关系，理论上前者可以涵盖后者。持“三阶段论”的学者，将第三个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述为“三个代表论”，显然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提出的今天，这种表述还缺乏延展性和包容性。持“五阶段论”的学者，划分较细，但对五个阶段话语的表述也存在不足，比如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作为第五阶段的重点话语，显然不具有太强的说服力。

因此，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的阶段性研究这块领域，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话语提炼概括不当，没有很好地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阶段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互斥性和延承性关系。相对来说，笔者认为，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述为“经济改革话语的生成”和“经济改革话语的演变”两个阶段，是比较合理的。

##### 2. 整体性研究：抓准核心，辐射全局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特点的整体性研究，不论是对话语理念的特点、话语宣传方式的特点，还是话语体系的特点，学者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但也存在矛盾和分歧。例如，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理念的特点，既有主张从“革命”话语向“改革”话语变迁的观点，也有主张向“执政”话语或“发展”话语转型的观点。不论何种主张，我们都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既是革命党也是执政党，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追求改革和发展的政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号召的那样，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共产党人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再如，关于意识形态话语宣传方式的特点，学者普遍认为，要从宏大叙事转向大众生活，但有的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正在淡化，而也有学者主张回归显性，这里也存在矛盾。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究竟在淡化还是显性化？这需要进一步回答，何谓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强是否意味着强制性色彩浓厚？当意识形态话语走向大众生活，是否意味着话语本身意识形态属性的弱化？意识形态话语又可否成为“流行语”？另外，关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特点，“多样性”“多元化”是学者的共识，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容易混淆的概念，究竟是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出现了多样性，还是人们生活中的日常话语出现了多样性？日常生活中的我们又如何

对意识形态话语和非意识形态话语做出区分？

整体性研究需要一种宏观的大局视野，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随着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话语向多元化和大众化发展，人们较难从整体上去把握这个时期意识形态话语最核心的内容，以及正确地辨识意识形态话语和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

### 3. 预测性研究：把握当下，各个突破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预测性研究，学者从话语理念、话语体系、话语目标和话语时空四个方面都给出了建设性意见，但也出现了观点之间的矛盾。例如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理念，不同的学者分别提出向“公正”“发展”“经济改革”等核心理念进行重新聚焦。在这里，“发展”理念不妥，因为改革开放初我们就强调“发展”；“经济改革”的表述不准确，至少应表述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始终是中心任务，不能偏离，这是解决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充分发展”问题的必然要求；“公正”似乎也不可缺少，因为这是缩小贫富差距，也是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的要求。鉴于此，未来比较合适的意识形态话语核心理念可以表述为“以公正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关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学者一致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或是以核心价值观进行构建，或是以“四个全面”加以完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指导话语体系的建设？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我们现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存在哪些缺陷？又应如何改进？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目标领域，学者基本主张以大众生活为定位，这里也存在观点矛盾：有的主张从文本话语向生活话语转换，从精英话语向大众话语转换（言外之意，只要大众话语和生活话语）；有的主张处理好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关系（言外之意，这三种话语都需要），那么，究竟只要大众话语，还是兼顾大众话语、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如果兼顾，这三种话语的边界是什么？此外，现有文献中还出现了“情感话语”“情感叙事”等范畴，那什么是情感话语？与大众话语、生活话语是何关系？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的时空维度，坚持继承与创新、开放与对话，这是学者的共识。但具体在哪些方面、哪些领域应该继承以及如何继承，哪些方面、哪些维度可以创新以及如何创新，如何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对话能力等问题，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正反经验的对比研究也比较匮乏，对具体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具体研究也相对稀缺。

预测性研究需要有前瞻性眼光，既不脱离当下，又能超越当下。目前这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对当下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把握不准，分析不足，研究不透，导致提出的建设路径比较空泛，缺乏针对性。为此，我们更需要抓住一些中观或微观的问题展开研究，逐个突破。

#### 参考文献：

- [1] 吴琼：《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困境及提升路径》，《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
- [2] 刘锋：《“南方谈话”前后我国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及其启示——以〈人民日报〉为研究对象》，《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5期。
- [3] 毕红梅、付林溪：《新媒体语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探析》，《思想教育研究》2015年第5期。
- [4] 杨鲜兰：《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难点与对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 [5] 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 [6] 杨昕：《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述评》，《探索》2012年第3期。
- [7] 邓景、唐韬：《试论网络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表达方式的转换》，《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年第16期。

（编辑：张 剑）